

纽约城市空间的“原真性再造”

——读佐金《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

□ 高 宇

“原真性”概念在城市问题领域中的提出，是对城市化特别是城市更新进程所引发的众多文化焦虑的集中反映。这和当今城市空间“中产阶级化”即“士绅化”的典型进程关系重大：在士绅化过程中，正是由资本、政府、媒体和消费者品位共同构成的文化力量推动着城市空间的不断更新和重构，这种更新催生出一种“城市居民对原真性起源的渴望”。^{[1]2}沙朗·佐金由此注意到，正是这一渴望本身制造了一种“新原真性的开端”。这无疑就引出了该概念所固有的矛盾特征，即“原真性”本身实际上是一种创造，一种社会的产物，也就是一种对历史和品质意义上的“原初”和“真实”的再次发明和重新规定。

每个城市乃至城市中每个本地社区空间都有着不同的原真性起源。通过沙朗·佐金对纽约布鲁克林等特色区域空间重构的分析可以看出，就一座城市而言，其不同的街区或

社区空间的所谓“原真性”起源样貌并不见得是唯一的，但这些差异性区域空间的原真性通常分享着一些共同面向，这些共同要素构成了其原真性吸引力的基础，并最终促成了新一轮的原真性再造。

一、具体社区空间的活化、更新与去历史化

佐金认为，在布鲁克林这样的地方，首当其冲的吸引力就是相比邻近的曼哈顿而言明显低廉的租金。就该区域的原真性吸引力而言，此地之所以租金低廉与其特定的“原真性”面貌有着密切的联系：布鲁克林地区工业化历史遗留的痕迹——如废弃的仓库和厂房、破败的房屋、工人阶级蓝领以及移民劳工的生活方式，乃至居高不下的犯罪率等——共同建构出一幅“粗犷”的美学图景。“粗犷”一词原本被用来描述“因工厂关闭以及从纺织品到钢铁等多年来支撑美国家庭的基本工业产品的

外包而陷入经济困境的工业城镇和城市社区”，是一个“媒体描述所有老旧城市社会弊病和审美败坏的代名词”。然而佐金敏锐地觉察到，这幅图景日益被视为一种独特区域“风格”的原真性资源。^{[1]59}总之，一系列的原真性因素使得布鲁克林为众多文化创作群体——艺术家、音乐家、作家、表演者等——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不仅在居住和创作上没有过重的资金成本负担，还有更多的场所和空间可供选择。

同他们一起前来的自然还有相应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本；作为特色艺术、独立音乐的赞助者与鉴赏者，这些新资本力量合力将众多街区改造成为音乐和艺术的大本营。在此尤其应当重视媒体和新闻写作者的影响：正是经由各种媒体如报纸、杂志乃至博客的追捧和大量推介和评论文章的生产和传播，一种具鲜明的“可识别且可供全球性文化消费的当地产品”——一种布鲁克林的全新原真性形象——被广泛地创造出来。^{[1]52}与此同时，新的“象征符号经济的生产”——食品和时装——也在这一基础上开始引进和发展，这包括但不限于特色餐厅、精酿啤酒以及各种时尚品牌，等等。总之，正如沙朗·佐金总结的那样：艺术画廊、表演空间、小啤酒厂以及邮差包共享了由一份废弃工厂和

两份艺术创新所构成的城市想象，所有的这一切引领了“布鲁克林制造”的创意组合。

整体上，布鲁克林那些以“粗犷”为名的原真性资源被消费文化广泛地吸收和艺术化再造，从而形成了某种“炫酷”的文化标签。这样一种“新原真性”的面貌，同布鲁克林“原初”的原真性吸引力并无关联，这乃是一种前者对后者的重新发明和置换的结果。这样一来，通过流行文化消费赋予衰落的街区以全新的魅力从而推动商业复苏乃至城市复兴的做法，就成为城市空间原真性再造的基本手段。同样享有原真性声誉的纽约东村，尽管其具体的原真性起源与布鲁克林有所不同，但原真性再造过程、方式和结果基本大同小异。由此，“原真性”似乎不再涉及真正的起源和开端，而是成为某种“风格”及其“品质”的表述方式。沙朗·佐金总结道，城市场所的原真性在此“成为某种被精心选择的生活方式，一种表演，一种置换的方式”。它往往借助文化、艺术乃至生活和消费方式的外表，以特定社会阶级的品位观念为核心话语，并通过其背后的媒体、市场、资本的逻辑以一种非强制性、渗透性和温和的方式重构了社区原真性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与本地原真性真正的起源相比，新的

原真性再造在实现了本地社区空间的活化与更新的同时,也显著却悄无声息地抹去了其真实的历史面貌。

二、一般公共空间的洁净、安全与去政治化

和具体的城市本地社区空间相似,城市公共空间也有其特定的原真性起源。一种“原真性再造”过程的发生——不仅伴随着士绅化的进行与发展——改变了原本的社区空间及其生活面貌,还在结构上根本地重塑了一般的城市公共空间。沙朗·佐金通过在纽约联合广场的观察意识到,这一进程通过私有化及其管理彻底颠覆了公共空间原真性文化的内涵。然而吊诡的是,正是联合广场的私有化进程赋予了这一公共空间以迷人的原真性魅力。

历史地看,公共空间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市集和广场,其最主要的特征在于与私人空间相对的、向所有人开放的民主性。尽管在其中并非没有特定(上层)阶级针对其他(下层)阶级在思想与行为上的干预措施,或许也并非完全能够满足每个人的使用需求,但公共空间总体上是开放使用的,因而总体上是属于公众的,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获得一席之地。上述这些特征透露了公共空间传统原真性的一些基本面向,即在公共空间中,民主

是其“原真性”最关键的要素。与此相关的是,像纽约联合广场这样的公共空间,其原真性正是充分体现在其自身政治的民主表达上。沙朗·佐金就注意到,联合广场与政治抗议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联合广场就见证了从独立战争时期声援联邦政府到劳动节工人集会等众多公众活动。^{[1]157-160}

在此处值得注意的是,民主也同样意味着因为人员的混杂与不确定性而对安全与秩序——不仅是人身安全,还有社会稳定——存在着潜在威胁。早期公共空间的这一典型特征可毫不费力地在巴黎建于17世纪的新桥上观察到。巴黎新桥在彼时就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地具有民主性,同样也因此伴随着相应的缺陷的公共场所。各个阶层和职业属性的人士都可以聚集在新桥上,他们不仅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使用它,各阶层彼此之间还能基本实现和平共处。新桥的活力和魅力自然有其代价,那就是混乱。在新桥上,不仅随时要提防(偷斗篷的)小偷,还要提防时刻与行人抢占空间的马车,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是人群和重大新闻的集散地,再加上此地的露天表演总是富有政治煽动性,新桥因而成为17世纪巴黎城市各种骚乱的摇篮。总之,17世纪巴

黎新桥上的公共生活，可以在侧面为公共空间的原真性面貌提供一个生动的参考。^{[2]30-45}

因此，民主性并非联合广场公共空间原真性面貌的全部；它事实上内在地充满着矛盾和对立。一方面，劳工抗议者频频利用联合广场举行抗议和集会无疑体现了其公共空间民主的原真性。而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伴随发生的，是联合广场自从19世纪30年代建成起（直到20世纪70年代）就一直经历的，从高档社区向平民大众的购物和娱乐区的降格过程^{[1]159}；由于商业中心的转移与其对工人阶级和平民大众的吸引力，围绕着联合广场进行的房地产开发可谓难称成功。

公共空间的这一原真性在当代城市环境中还伴随着其他的困扰，这一困扰并不直接威胁安全，但普遍被认为是通向威胁的前奏。这一困扰就是在道德层面上令人不快的一系列行为：吐痰、酗酒、乞讨以及在户外公共场所过夜等集中被视为是“社会岌岌可危的预兆”。沙朗·佐金分析认为，与此类似，公共空间如公园和广场中的乞讨、卖淫、毒品交易以及毁坏公物等行为都显示了“一个更加包容而麻痹的社会，以及广泛疏离了职业伦理和国家权力的双重规训”。总之，这反映了一种“对城市失控的普遍性忧虑”。^{[1]156}

于是，有关城市衰落的现实及其叙事不绝于联合广场。除此之外，本地政府职能部门一方面由于预算问题无法为更好的公共服务承担花销，另一方面由于联合广场分属数个政府机构分管，因而治理效率低下。总之，上述这一系列困境交织在一起，实实在在地刺激了联合广场公共空间的私有化进程。

于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广场开始了其私有化进程。这一进程主要由一系列公私合营的部署作为开始，最终形成了一系列由当地企业和私人资本力量组成的私人协会，它以接管空间的不同类型分为不同的形式：包括商业改进区、地方开发公司和公园管理委员会。不管究竟如何称呼，这些组织集中表明联合广场的公共空间从此归于一个商业地产所有者的私人组织所有，并由它负责“执行融资、维护和管理公共空间的职能”。^{[1]152}

联合广场合伙企业的措施主要分为两方面，其一是解决清洁问题，其二则是加强安保措施。如此一来，不仅购物街、商业区以及公共公园成为一个洁净与安全兼备的理想都市环境，一种公共空间的文明气象得到了恢复甚至改进。中产阶级化以及商业复兴使得本地居民获益良多：由于联合广场恢复并产生了更多的活力，公众异常满足于此地所

提供的安全和秩序。在他们看来，正是商业改进区而不是政府职能部门促成了这一梦寐以求的转变，因此，不论从商业还是从名誉上，联合广场合伙企业从这一投资中获得了极为可观的收益。

三、新兴消费空间的林立与 创意城市的兴起

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中，一种定义城市文化形态的“原真性”经历了显著的丧失与再造。这一总体进程是经由一系列各不相同却彼此关联的方式得以开展和完成的。一方面，现代主义建筑与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不断地在整体层面上影响和重塑着城市空间的原真性外观、结构和肌理；另一方面，私有化资本力量和国家治理对空间的双重干预——集中体现为城市空间的士绅化——不仅导致具体社区的原真性本地生活空间样态被充分改写，就连公共空间及公共生活的原真性特质也得到了根本的重塑。在后工业化城市中，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逐渐取代了以工业制造业为代表的生产，在这一背景下，消费逐渐开始引导生产方式的走向，就城市空间而言，消费于是取代了生产，成为城市空间使用方式的核心决定因素。和士绅化一样，城市原真性再造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消费体制下的新的城

市地理状态”。^{[3]69}

这一过程带来的结果，就是新型消费空间的林立与创意城市的兴起。在本地社区空间中，相对于支持原本常住于本地社区居民的基本社区商业而言，所谓的新型消费空间集中体现了新到来的阶级和群体（通常是中产阶级）的多元化的生活方式、社交体验以及消费品位的影响力，并且通常增添了明显的审美气息。这些空间通过独特的文化产品和可以全球营销的基本特征创造了一种相对于原生态社区文化而言的新的“原真性”。沙朗·佐金称之为某种“卡布奇诺式的驯化”——星巴克这样的咖啡店通常是这种改变原生态社区的新型消费空间出现的标志。

在商业购物中心、广场和公共公园这样的公共空间中，由于私有化的控制及其相应措施——对街区空间卫生环境和治安环境的重视，使得公众倾向于聚集于此，并将这样的场所视为“真正的”公共空间。因为这样的空间能够为他们提供一种基本的集会面、购物、获取信息和相互交往为一体的稳定、安全和洁净的秩序化环境。因此，这里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原真性制造”的逻辑，即被认为是具有原真性的事物或场所，其原真性的获得源自社会各方面在达成一致的前提下的共

同建构，而并非对某种真正原真性起源的指认和印证。就伴随士绅化等进程出现的新型消费空间而言，其原真性是在使用者，即消费者和不同的商业利益乃至社会管制的要求下共同协商而形成的。

在这一“原真性制造”的逻辑基础之上，便可以透视一种“创意城市”的兴起。所谓“创意城市”，实际上指的是当今城市在后工业化阶段更多地转向依托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策略的现象。在这样一种转向中，文化成为展示城市独特创新的舞台和大众消费的核心内容；创意设计领域成为这一切的动力和引擎。导致城市形象危机的根源可能多种多样，但让城市形象得以改头换面的解决策略，不外乎塑造一种总体的全新“城市品牌”。这一策略无疑极大地依赖于对某种文化原真性的挖掘和包装。事实上，“创意城市”可以说是城市特定文化原真性的制造和再造的集中体现，其最重要的结果就是造就了佐金说的所谓的“目的地文化”。^{[1]270}它表明了城市形象的彻底扭转——人们不再逃离城市特定区域，反而被其所吸引并趋之若鹜。在此，目的地文化的消费模式不断试图告诉人们，在一种全新的城市原真性空间中“一切都与审美有关，

而不涉及权力”。

四、作为文化权力工具的“原真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城市空间特定原真性的再造是经由社会各方面综合协商和共同建构的结果，并且其结果令其使用者（作为空间使用者的居民及消费者）和投资管理者（作为联合投资—管理者的私人企业资本和政府部门）双方皆获益匪浅。然而，这一看似双赢的结果并非全然无辜的。城市空间原真性再造的过程并非总是呈现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事实上，其中隐藏着难以忽视的冲突和对立；这首先体现为一种空间的私有化控制与国家权威化控制的新手段。

沙朗·佐金对联合广场复兴的分析揭露了诸多隐蔽着的不平等因素。她富有启发性的观察表明，由安保措施主导的城市空间及景观的改进工程通过“将每个人置于其他人的监督之下”以实现“个体行为在公共空间中的抑制”。不仅如此，新的公共空间也努力地隔绝了所谓“异类”的陌生人群——“流浪汉、精神失常者、边缘犯罪者以及仅仅是大声喧哗和令人讨厌的人”。在佐金看来，这种“新型的公共空间治理”的策略事实上“给那些将适当行为规范内化且时刻监视他人以确保他们安分守己的成人消费者创造了一处‘精

心修整的空间’的游乐场”。^{[1]165}这种私人化和私有化了的公共空间于是将特定的社会团体排除在“被私有财产所认同的财产权”主导的“公共空间”之外。一种真正的“定义城市生活的体验与交往的多样性”由此遭到弱化，于是社会不平等实际上被隐蔽地加强了。这反映了一种“通过地方经济发展的目标来应对社会、政治和道德危机”的做法，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则借此“将原本属于自身的职责转交给私人团体”。^{[1]170}

这并不是说，国家职能部门在公共空间的组织和管理职责全部让位于私人利益集团。在佐金所分析的另一个案例中，作为纽约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共空间——世贸中心遗址——集中体现了国家认同的功能。尽管世贸中心遗址和联合广场在“公共所有权、私人管理和公共用途”以及私有部门和政府共同承担开销这两方面极其相似，但前者相对于后者更多地承担了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就是说，同样作为公共空间，世贸中心遗址在其上施加了绝对的国家权威控制。^{[1]176}除此之外，由于这一灾难对公共安全事项的刺激，警察部门借此强化了安保措施网络，其范围“不仅超出了世贸中心遗址，而且扩展到周围街道、公园和人行道等更广阔的区域范围”。^{[1]183}

在此，尽管由于各种事关公众

话题和公众决策的原因，世贸中心遗址似乎才应当更具有公共空间的性质。然而事实上，在纽约世贸中心遇袭的非常时刻，由于地理区位以及封锁命令等因素，人们自发地聚集在联合广场进行哀悼和获取信息的活动。而且当局在危急时刻也没有对此加以控制；相比较之下，人们往往会认为联合广场才是那个更具“原真性”的公共空间。由此可见，私有化控制尽管相比国家职能部门而言较少具有压制性和意识形态色彩，但它本质上仍然抹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所具有的民主原真性，而将其替换为一种由商业利益主导的另一种权威化机制。因此，社会和经济资源上的不平等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进入公共空间的权力的不对等。在此，私有化控制与国家意识形态悖论性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变异了的原真性公共空间。

五、一种“霸权主义”的视角： 城市文化权利的空间争夺

城市原真性空间再造过程中内涵的另一种矛盾与冲突，则明确地体现在种族问题上。佐金在对布鲁克林原真性再造的分析中认为，当地的“酷文化”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新的、白种人的国际化形象”；曾经的“包含工人阶级白人、黑人和波多黎各人的种族大熔炉转变为主

要是艺术家和音乐家混居的白人文化区”。当布鲁克林特定的街区由于士绅化及原真性再造成为全球闻名的时尚区，这一改造的益处并没有波及其他街区特别是黑人和拉丁移民聚集的街区，这些地方“依然无法摆脱破旧的房屋、衰败的学校、就业缺乏以及高犯罪率等问题”。^{[1]62} 尽管嘻哈音乐和黑人电影的出现将这些地区重新定义为一种“另类的粗犷”，从而形成了属于黑人群体的“原真性”，并通过商业化和品牌化获得了不菲的经济利益，但黑人布鲁克林街区总体而言并没有像其他街区（比如威廉斯堡等）一样因为文化产品的增长而受益。正相反，布鲁克林在人口上总体呈现“白化”的特征。

同样的情况在纽约的哈莱姆区体现得更为典型。在一般美国民众印象中，哈莱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人种族聚居区。然而经由资本与国家的外在力量开展的扶持和开发以及新时尚生活媒体的关注与支持，哈莱姆同样开始了中产阶级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一种“新的世界主义”逐渐产生，不仅无法负担市区高额房租的青年学生、中产阶级白人居民大量迁入，并且越来越多的黑人群体通过教育和工作同样实现了自身的中产阶级化；另一方面，地产开发商、零售企业、

媒体乃至部分政府机构也广泛地进驻该区，二者为哈莱姆带来的全新面貌与原初的“黑人贫民窟”印象之间产生了深刻的裂痕，原本属于黑人群体身份认同的原真性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为舒适的、中产阶级、种族融合的世界主义社区”；这种特征定义了哈莱姆全新的原真性。一种所谓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进程重新书写了当地的原真性起源：从不折不扣的“黑人之都”摇身一变成为多元种族的聚居地。

最后，由于城市空间原真性再造在某种程度上与士绅化几乎可以视为同义词，自然不能忽视这一过程所蕴含的中产阶级化表达。进入20世纪以来，以勒·柯布西耶和罗伯特·摩西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和国家行政机构的联合力量导致了深重的城市形象危机，针对这一危机的普遍反应就是对城市原真性的呼唤。然而佐金在分析诸如简·雅各布森及她的盟友们所倡导的原真性城市空间及其社会生活面貌时发现，这些人所表达的正是“一种中产阶层化了的人对都市纯正性的审美品位”。也就是说，原真性并不是一个既定的标准。此外，由于阶层主体各异，在城市形象危机中所追求的原真性内涵以及其结果也各不相同。

在此，可以将“原真性”视为对士绅化这个“脏词”进行“士绅

化改造”的表现。尼尔·史密斯认为，对于士绅化这样的过程究竟该做何种表述存在着分裂：认同这一进程的人倾向于使用“街区资源再利用”“升级改造”“复兴”等中立的字眼——“原真性”显然可以被放置于这些表述之列。它表明了蕴藏在“士绅化”这个词中的乐观主义因素以及对其进行正常化、合理化修辞的努力。由此可见，“原真性”和“士绅化”一样，二者共同体现了一种中产阶级自我标榜的所谓自由和批判的精神意蕴。尼尔·史密斯发现，在有关士绅化的争论中，有关城市空间权利的表述主语被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改造了：政治主体变成了“我们”，而不再是“他们”——群众、工人、大众。由此一来，在反对士绅化及其对特定阶级群体的暴力和剥削的同时，中产阶级也将工人阶级“改造成不相关

的阶层”。^{[3]59}因此，同样，任何“原真性”都是一种主观的原真性。它通过消费的手段形塑文化身份的认同，进而建构新都市中产阶级的趣味、喜好和习性，并借此一点一滴地取代了工人阶层、贫困阶层，包括黑人以及少数族裔。

注释

[1] 沙朗·佐金. 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2] 若昂·德让. 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3] 尼尔·史密斯. 新城市前沿：士绅化与恢复失地运动者之城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魏建宇)

郑重声明：作为一份办刊历史悠久、社会声誉良好的学术刊物，《中国图书评论》从未委托任何网络中介机构或个人从事征稿或代发稿件录用通知书事宜，也绝不向投稿作者收取审稿费和版面费。广大作者投稿之际务必慎重，不要轻信网络中介。

请投稿作者关注《中国图书评论》官方微信了解刊物详细信息，并认准唯一投稿邮箱：Chinabookreview@163.com。

以上，敬请广大投稿人互相转告周知。

版权声明：作者投稿至本刊或接受本刊约稿，即视为作者同意授予本刊该作品的专有许可使用权，包括但不限于该作品的复制权、发行权、广播权和电子与网络传播权等。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授权费用。